

时序更替，思想先行，大时代尤其需要大智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勇于实践、善于创新，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而今，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这当中，一系列新思想，来自于火热实践，呼应时代需求，着眼于推动解决当前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既有继承性，也有创新性，针对现实问题、服务人民需求，为新时期的中国发展提供了思想依据。

### 1 新思想包含丰富的内涵

思想是行动的指南。

专家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理论基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历史基础，以世情国情党情为现实基础，提出了治国理政的一系列新思想，从内容来看，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从范畴来看，涉及到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方面；从认识问题的哲学思维来看，涉及到历史思维、战略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系统思维、底线思维、创新思维、开放思维等多种思维。这些新思想，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经济发展新常态，再到一系列思维方式等，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充分体现了党中央治国理政运筹帷幄的思想智慧。

关于进一步深化对“三大规律”的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三者统一，是治国理政的实践追求。科学认识并切实遵循“三大规律”，是党和国家事业破浪前行、蓬勃发展的基本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民族复兴处于由大向强、改革发展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战略机遇期内涵发生深刻变化。经济进入新常态，政治生态要重构，利益格局需调整。一系列治国理政新思想对“三大规律”的认识不断凝练升华，更有效、更精准地推进了治国理政的新实践。

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思想。三年多前，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就是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中央党校副校长兼哲学部主任韩庆祥对本报记者分析认为，新思想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给出了新的阐述，主要体现在：强调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能丢，这体现出在根本问题上的政治清醒和战略定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从实践、理论、民族、时代四个方面加以阐释；在当今中国整体转型升级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要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就必须积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

的伟大斗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实现民族复兴的理念总引领和实践总方略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关于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新思想。习近平指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表现出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特点，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些变化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要求。必须充分考虑这些趋势和要求，按照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总要求进行战略谋划。

中央党校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组首席专家严书翰对本报分析认为，“经济新常态是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新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经济新常态首先是经济范畴，它所包含的特点指明了中国当前和今后很长时间内经济发展的趋势，同时也是经济社会范畴，因为它是对中国社会初级阶段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的阶段性特征形象而准确的表达，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只有承认它，才能适应它并且有效地引领它。”严书翰说，经济新常态是我们认识当下、规划未来、制定政策、推进事业的客观基点。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新常态是关于中国发展的新思想。”严书翰说。

科学的思想方法，则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引。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陶文昭对本报记者分析认为，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的理论和实践中，贯彻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体现了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历史思维、法治思维和底线思维等。

“这些思维内在联系、相互贯通，构成了治国理政的科学思想方法。”陶文昭说。

韩庆祥认为，这些思维，新就在习近平赋予其新的时代和实践内涵，从而使这些思维不仅仅是概念性和本义上的，而是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内容，具有时代和实践基础，能把治国理政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 治国理政新思想

本报记者 叶晓楠

### 3 新思想指导新实践

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究其根源，都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将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应用于指导实践，将充分发挥中国发展的巨大潜力，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正是在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指引下，中国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全方位地推进，发展取得了新成就，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写下了历史发展新篇章。

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导下，中国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反映了新一届党中央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思考和顶层设计，规划了实现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总体方略。

在整体转型升级时期的实践中，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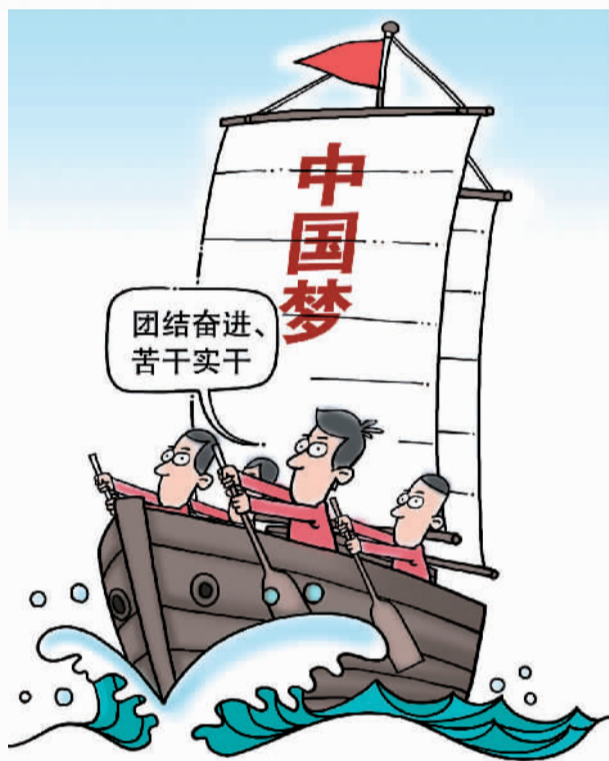
思想既注重从战略上治国理政，又注重运用辩证思维来处理治国理政中各种复杂的矛盾关系。

“这种战略辩证法在治国理政中的根本体现，首先就是确定好治国理政的战略目标。这种战略目标，既包括新一届党中央所要实现的战略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包括未来长远发展的战略目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二者有机统一，就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韩庆祥说。

在经济新常态新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大力推进一系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改革纠正供需结构错位和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改善供给结构，创造新供给，培育新需求，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新方式。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高级研究员彼得罗夫斯基评价指出，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提出治国理政新思想，是在中国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总结提炼而成的，对中国发展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的确，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从实践中升华，又从实践、深刻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新高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向梦想前进 大巢作(新华社发)

### 2 新思想有继承更有创新

凡事欲知其然，必先知其所以然。

新思想从哪里来，其所回答的时代课题主要是什么？那就是内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直面新的历史条件，是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集中体现。

“我们应围绕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及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来把握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韩庆祥认为，实践上的新发展必然带来理论上的创新，实践前进一步，理论创新就跟进一步。只有弄清新一届党中央所处的历史方位，才能为新思想所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提供依据。“这是一个前提性的重大问题。”韩庆祥说。

新思想有鲜明的历史继承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都体现了对历史思维的学习和运用。

“强调历史思维，就是要把握新一届党中央的治国理政，放到五千年中华文明历史发展历

程中来思考，放到中国近现代历史当中来审视，放到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来分析，放到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与现实逻辑当中来把握，放到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当中来谋划。这是一种大的历史时间观，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历史基础。”韩庆祥认为。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共产党发展理念演进的历史轨迹：从中国共产党对发展理念的最初认识，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展理念的不断推进，再到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发展思想对发展理念的创新，习近平发展思想与中国共产党对发展理念的认识一脉相承，又有重大创新。”严书翰分析说。

同时，治国理政新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指出，“要根据时代变化和现实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



推动 大巢作(新华社发)

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具体分析可知，内涵丰富的治国理政新思想所针对的问

时代变化中不断认识和解决新问题，在与时俱进中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十八大以来，面对发展起来的阶段，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心主要是解决这一阶段所呈现出的新问题，完成这一阶段所提出的总任务。”韩庆祥说。

要回答当前中国发展“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的新课题，经济新常态新思想应运而生。

为什么会提出经济新常态？严书翰认为，就是因为国际国内的经济出现了新情况，当下的中国，不仅不能重新关门来搞发展，而且要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同时也面临着国内发展中的新矛盾和新挑战，最为明显的是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矛盾。我们还应该看到，在经济新常态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的发展正朝着更加重视质量、效益、创新，更加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更加重视民生改善和社会公平的方向转变。因此，关于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战略判断，是习近平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和

发展大势、尤其是针对中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形成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发展思想的重大创新。

在陶文昭看来，对于治国理政新思想，从理论继承性来说，要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去理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内，而不是之外；要纳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去理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要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去理解，是在致力于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创新而言，新思想则是切中了21世纪的新时代，立足于中国的最新国情，扎根于当代中国的最新实践。

在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如何解决发展问题、避免发展陷阱、走出发展困境、防范发展风险，中国在思想方面所做出的种种探索和努力，为回应时代发展问题，提供了创新性的思想解答。

## 大家之言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将中国的成功归因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下简称“中国制度”）的活力，并对其“创新性”和“变数”充满好奇。实际上，中国制度是形成有据、创新有道的。独特的文化传统、巨大的人口规模、复杂的社会转型、坚定的价值追求，是推动中国制度形成的重要因素。坚持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是中国制度创新的内在逻辑。我们党在带领人民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以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的高度自觉，辩证把握和处理制度建设中的各种因素与关系，是中国制度永葆活力之道。

在现代化追赶之路上，中国既没有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没有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创造了后发现代化的“中国奇迹”，奠定了中国制度自信的现实基础。我

## 中国制度永葆活力之道

孙来斌

我们党在推进改革创新过程中对改什么、不改什么同样有着清醒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始终坚持，这是制度创新的底线；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必须改变，这是制度创新的主攻方向。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56个民族、13亿多人口，如果没有离开的坚强领导，就会出现一盘散沙甚至分崩离析的局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将化为泡影。在这方面，世界上有许多值得汲取的经验教训。一些转型国家盲目移植西方多党制、自由选举制，结果导致“民主之殇”：有的改旗易帜，

步入歧途；有的水土不服，陷入党争之乱；有的引起内战，国家四分五裂。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坚持党的领导与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内在一致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创新制度的衡量标准，积极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积极作用。制定制度要广泛听取意见，这是中国制度创新的一大特色。“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为

推进有关制度的落地持续发力，“八项规定”和巡视制度不断显现威力，“民意直通车”“电视问政”等民主新鲜事不断涌现。美国学者福山通过比较得出结论：“中国模式具备一些西方民主制度没有的重要优势。在过去十年中，中国人民享有较大的思想和言论自由，政府治理方式不断改进，纠错机制发挥了明显作用。”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民主与民生构成一对特殊的重要矛盾。离开民生的民主说教，人民不感兴趣。“美国虽然很穷，但民主很发达。”这种西方民主价值理念的逻辑荒诞性不言自明。制度的设计权如果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社会就会出现少数人与多数人的利益阻隔及社会断裂问题，陷入“李嘉图陷阱”。坚持党的领导，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度设计的出发点，从而实现民主与民生的良性互动，是中国制度活力的重要源泉。

(作者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邹雅婷摘编)